

# 理直气壮维护网络空间主权

□杜雁芸

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首次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的原則。中国是网络主权的发起国和倡导国,早在2010年《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中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2015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首次将“网络空间主权”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在去年乌镇互联网大会上,习主席指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

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打着“全球公域”和网络世界“互联互通”的旗号,极力弱化或否定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主权。他们排斥网络主权,推崇“网络自由”,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量:首先,美国倡导“网络自

由”,通过信息“自由流动”侵犯他国主权,而网络主权的提倡会使他国网络管控更加严格,影响和削弱美国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美国政界、学术界和产业界精英为代表的互联网自由主义者主张,互联网无国界,对互联网的访问、管理都应超越单纯的民族国家的界限,达现一种不受限制的、完全自由的状态。实际上,所谓的“网络自由”,只是美国推行其价值观的政治工具。

其次,美国在网络攻防技术和网络治理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网络主权会限制美国的优势,削弱其全球霸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网络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头雁。美国不仅具备超强的网络攻防技术,而且在网络治理方面也具有绝对优势,其独霸网络资源的分配权力,掌控着互联网主动脉,握有互联网核心技术,还享有网络控制的主导权,其对互联网通讯干线、基础设施和关键设备具有控制能力,能够操控信息源并主导网络语言的形态存在,同

时美国还有意主导网络规则的制定等等。美国利用其技术优势,在增强自身网络安全的同时加强对他国信息与安全的控制,从而实现其网络霸权图谋。

对于网络霸权国家来讲,最好没有网络主权,这样它就可以自由出入于网络空间的每个节点和角落;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网络主权却是管辖本国网络、维护本国网络安全的前提。若没有网络主权,网络安全也就失去了根基。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强调尊重网络主权,不是要割裂全球网络空间,而是强调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各国无论互联网发展快慢、技术强弱,参与权、发展权、治理权都应是平等的,都应得到有效保障。当前,我们要将网络主权视为国家主权的最新“制高点”,有力反击美国的网络强权。正如习主席强调的,要理直气壮维护我国网络空间主权,明确宣示我们的主张。

(作者单位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近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美国HBO电视网采访时称,美国的军事干预在某些情况下往往会导致出现全球范围的大问题,并强调了外交手段对于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性。此话一出,即被一些媒体解读为美国终于“承认”了武力干涉的局限性。为何奥巴马出此“反常”之语?将武力作为其政策推动工具的美国难道要改弦易辙?实际上,这次表态连同他任期内美国对外战略的一系列调整都是冷战后美国外交出现的一次“民主党式”回摆。

美国的对外战略一直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体系压力的大幅减少,国际政治因素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在下降,而国内因素的作用在上升,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外交政策已经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代表东北部—太平洋沿岸利益的民主党与代表南部—中西部利益的共和党,在外交议题上就存在着全然不同的偏好甚至是对立。

## 奥巴马何出“反常”之语?

□王 浩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去工业化”进程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美国传统制造业逐步走向衰落。但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共和党的布什政府被冲昏了头脑,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导致美国国力透支,深陷泥潭。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有意识进行了战略回调,在外交政策上也趋保守,反对增加军费,减少海外干预。往往支持美国更多地依靠国际制度、多边合作与盟友体系,亦即运用外交而非军事手段,以一种相对低成本的方式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国家的主要精力及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

而就新当选的特朗普而言,其竞选主张有很多方面也体现了国内因素的影响,反而与鼓吹扩张性对外战略的共和党传统思路不尽相同,这恰恰反映出在金融危机和“国际化”大潮冲击下,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发生的新变化。

基于冷战后美国社会利益变迁及其力量对比形成的格局,两党政治精英包括总统和国会议员,从赢得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个体政治理念出发,始终无法达成稳定的对外战略共识,这就导致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走向呈现出一种漂移或摇摆状态。美国之所以无法构建起稳定的对外战略,根源就在于国内政治—社会的两极化结构下的利益冲突,使得政治精英的决策自由度所剩无几。

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奥巴马就任后美国外交为何回摆到了多边主义与国际制度,同时强调慎用武力、“不做蠢事”,采取一种战略收缩的整体姿态。归根到底,这种“民主党人”式的外交理念是由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变化所决定的。因此,奥巴马此次的表态完全是其个人及所属党派基于政治理性选择的产物。

对美国来说,两党间外交政策的对立局面短期内无法逆转,因而其对外战略的漂移和摇摆特征难以出现根本改观,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未来将更具矛盾性。

(作者单位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人大释法,维护香港稳定

□谢 军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7日上午经表决,全票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以下简称释法),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宪制权力作出的与基本法有同等效力的法律解释,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

首先,根据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基本法进行解释,明确有关条文含义。这既是权力,也是宪制责任,是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的必要之举。人大释法强调既要贯彻“一国两制”不会变、不动摇,也要保证“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澄清了香港社会的模糊认识,廓清了所谓的“法律灰色地带”,在“众说纷纭欲乱真”中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人大释法也亮明了中央在依法遏制和打击“港独”势力、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香港特区根本利益上的坚决态度,给“港独”分子设置了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

其次,在香港现行有关法律和规则对有关宣誓的规定不完备、社会上对有关规定的理解存在争议,并导致立法会的正常运作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人大释法有利于正本清源、定纷止争、划明底线、完善制度,有助于外界清晰、准确地理解基本法有关条文,维护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再次,虽然人大释法是在香港法庭受理相关案件后启动,但这并不是不信任、不尊重香港法院,而是在立法会因宣誓问题和暴力冲击而无法有效运转的情况下,遵循普通法上所说的“情势必然性”而做出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恢复立法会的工作,恢复香港的秩序和稳定。同时,人大释法也不会削弱香港法院的司法独立性,人大释法与基本法具有同等效力,具有宪制性地位,香港的司法独立本身就受到人大释法和基本法的约束。

最后,“港独”思潮近年来在香港不断

滋生蔓延,严重冲击香港社会稳定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次“宣誓风波”涉事者宣扬“港独”,严重违反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及香港特区有关法律,触及“一国两制”的政治底线,遭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华侨的强烈谴责。人大释法,赋予基本法第104条中“拥护”和“效忠”这两个关键词明确清晰的含义,有利于赋予基本法更强的生命力,保障基本法能更有效地应对香港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随着本次释法的作出和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将能够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香港特区政府也能够依法高效施政,促进香港经济稳定健康发展,解决香港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实现香港社会和谐安定。有了人大释法,爱国、爱港人士能够更加自信地参与到香港建设中去,有利于进一步稳固香港金融大都市地位,增强香港发展活力。

## 叙危机外部势力难咎其责

□孙德刚

近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接受采访时称,他认为,叙利亚冲突是“冷战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某种战争”,批评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本属叙利亚内政的问题变为全球和地区国家争相介入的地缘政治博弈。叙利亚危机迄今已持续六年,造成25万人死亡、400多万人沦为难民,叙利亚从中东文明的摇篮变成了世界上难民输出最多的国家。

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和恶化,与外部势力的插手存在重要关联。首先,从国际层面看,美俄英法等国的干预,不仅未能缓解叙利亚冲突,反而使国内冲突国际化和多边化。美国以“反独裁、倒巴沙尔、反恐”为口号,积极扶植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人,试图在叙利亚建立亲西方政权,阻止俄罗斯和伊朗在东地中海地区扩大影响力。俄罗斯则积极维护在叙利亚的军事利益,将其打造成从黑海到地中海战略通道

上的战略支点。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面对西方的制裁和围堵,俄罗斯在叙利亚以攻为守,反制西方。

其次,在地区层面,沙特、土耳其和伊朗等也加大了对叙利亚事务的介入力度。在沙特看来,叙利亚是泛阿拉伯主义的最后大本营,巴沙尔是继纳赛尔、萨达姆和卡扎菲之后,最后一位扛着泛阿拉伯主义大旗的领袖,又在战略上依靠伊朗,对沙特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地缘政治诉求提出了挑战。伊朗则利用叙利亚危机,扶植巴沙尔政府,试图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的什叶派力量连为一体,构建“什叶派新月地带”。土耳其则积极利用叙利亚危机打击土耳其库尔德分裂势力,阻止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寻求独立,防止在土耳其库尔德人地区产生连锁反应。

外部势力对叙利亚局势的介入,使原本内生性的叙利亚危机复杂化和国际化,

叙利亚局势走向牵动着全球和地区大地地缘政治博弈的神经。外部势力寻求代理人,使叙利亚族群矛盾和教派差异被无限放大,库尔德人、阿拉维派、逊尼派等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被唤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国家认同,成为大国介入叙利亚事务的工具。大国围绕叙利亚的军事斗争恐将常态化,叙利亚人民成为这场外部势力主导的政治游戏的牺牲品。

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必须以对话和谈判为手段,必须以联合国为主导,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必须以叙利亚人民为主体。中国以实际行动劝和促谈,积极推动叙利亚问题的解决,促进中东局势的稳定。中国在中东坚持不结盟、不谋求势力范围、不寻求代理人的做法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赏,这是中国为中东的安全治理贡献的智慧与力量。

(作者单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